

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响的内在机制

——以城市归属感作为中介变量的实证考察

赵佩, 黄德林

(中国地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基于武汉市、郑州市、北京市 1 286 份农民工样本调查数据, 以城市归属感为中介变量, 探讨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 结果表明: 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身份认同的五个指标中, 农民工收入地位认同对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最大, 其次分别为生活方式认同、人际交往认同、自我角色认同、制度处境认同。身份认同不仅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有直接提升作用, 而且可通过正向作用于城市归属感间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具有代际差异。自我角色认同、收入地位认同、人际交往认同、生活方式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第一代农民工, 而制度处境认同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新生代农民工。

关键词: 农民工; 身份认同; 城市归属感; 定居意愿; 代际差异

中图分类号: C913.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0)05-0036-08

Internal mechanism of identity impact on migrant workers' urban settlement willingness: an empirical study with the sense of urban ascription as an intermediary variable

ZHAO Pei, HUANG Delin

(College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ample survey data of 1286 migrant workers in Wuhan, Zhengzhou and Beij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dentity impact on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settle down in cities with the sense of urban ascription as an intermediary variab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identity ha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migrant workers' urban settlement willingness. Among the five indexes of identity, migrant workers' income status exerts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their urban settlement willingness, followed by the identity in lifestyl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elf-role and institutional situation. Migrant workers' identity not only directly motivates their desire to settle down in cities, but also indirectly intensify their urban settlement willingness through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ense of urban ascription. Generation gap exists in the influence of identity on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settle down in cities. Self identity, income status identity, interpersonal identity and lifestyle identity have a stronger impact on the urban settlement willingness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than that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while the institutional identity has a greater influence on the first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than that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Keywords: migrant worker; identity; the sense of urban ascription; settlement willingness; generation gap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工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然而受

城乡二元体制的束缚, 其融入城市的渴望与制度性的社会排斥之间存在反差。他们虽然工作、生活在城市, 但却无法充分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对城市社会难以产生认同和归属, 孤立化和边缘化趋势明显, 是“返乡归根”还是“扎根城市”成为其两难选择。随着时代发展, “80后”和“90后”农民工日益成为城市农民工的主体, 其思

收稿日期: 2020-08-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ZZ069); 武汉市社会科学基金 2019 年后期资助项目(2019025)

作者简介: 赵佩(1990—), 女, 湖南郴州人, 瑶族,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社会治理、思想政治教育。

想观念、价值追求不断发生变化,“返乡归根”不再是农民工的唯一选择,通过自身努力“扎根城市”,完成向市民身份的转型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提出,“每年多解决 1 000 万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可实现约 1% 的经济增长”^[1]。农民工市民化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最终需要通过定居城市加以显现。探究新时期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积极鼓励和引导他们定居城市,对于破解农民工“城乡两不靠”的“半城镇化”困局,促进我国经济稳步增长和城市社会安定和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界针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理论研究包括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劳动力迁移理论、推拉理论、剥夺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社会认同理论等。实证研究取向主要集中于:第一,个体差异论。由于农民工个体出生年代和成长环境存在差异,其城市定居意愿也各不相同;与家庭、地域特征相比,包括年龄、工作经历、婚姻状况、收入水平在内的个体特征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响更大^[2-5]。第二,资本因素调节论。以教育和培训为主要形式的人力资本、基于“市民互动”形成的新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起正向调节作用,而以“老乡关系”为主的初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起抑制作用^[6,7]。第三,收入水平制约论。农民工城市定居决策有赖于其在城市的资本积累,当农民工的实际收入与期望值差距过大时,其相对剥夺感愈发尖锐,从而影响定居意愿^[8]。第四,社会福利吸引论。该观点认为城市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民工定居城市有明显的“拉力”作用,尤其是居住环境、医疗卫生条件、教育资源、基本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对促进农民工城市定居作用最为显著^[9-13]。第五,“向城市化”心理驱动论。选择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往往具有“向城市化”心理,即对城市有着较强的“亲近感”和“归属感”。包括基于空间和心理维度的“城镇亲近感”、自我身份认定在内的心理因素均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驱动作用^[14-16]。

纵观现有成果,农民工城市定居动因研究多集中于客观因素上,而主观因素分析相对匮乏。从行为心理学角度来看,认同是个体行为的动力源泉,行动者作出的具体行为选择往往建立在意识层面的某种认同基础之上。城市定居是农民工基于城市生活心理体验作出的行为选择,与农民工对城市的

认同和归属感紧密相关^[17]。在已有的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研究中,虽有少数学者涉及身份认同和城市归属感因素,但都只是将其作为非主要因素提及,对其作用于农民工城市定居的微观机制并未深入研究。鉴于此,笔者拟以武汉、郑州、北京三个城市 1 286 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为基础,从社会认同理论出发,以农民工主体性为视角,引入农民工城市归属感这一中介变量,分析身份认同因素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响的内在机制,以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城市认同是农民工对城市生活场域安全感的重要彰显,大体包含对“市民”群体的认同(身份认同)和对城市地域的认同(城市归属感)两个基本方面^[7]。身份歧视和制度性社会排斥不易使农民工形成“市民”身份认同,却易催生普遍的“过客心理”,无法满足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需求。与此同时,城市归属感的欠缺也会加剧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短视行为”,进而影响城市定居等长远决策。由此来看,三者之间可能存在身份认同→城市归属感→城市定居意愿的逻辑链条。

1. 身份认同与农民工城市定居

城市定居决策的作出包含两个要件,一是城市定居的意愿,二是城市定居的能力。相关研究表明,农民工“市民”身份认同对其永久性迁移决策具有重要影响^[18,19];对城市生活更为接纳、对市民角色更为认同的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也更强烈^[20]。消费者决策理论认为,消费者往往会以自身“身份”为依据作出消费行为以自我证明^[21]。随着农民工对“市民”身份认同的提升,其消费理念、消费模式、消费习惯愈发与城市居民类似^[22],消费水平不再徘徊于“农民”的长期低迷状态,更倾向于作出城市购房等长远生活打算。同时,“市民”身份认同也会正向激励农民工采取与“市民”身份相一致的劳动力市场行为^[23],有助于其劳动供给状态的稳定、劳动供给意愿的强化以及劳动供给能力的提升^[24],从而为农民工城市定居的资本积累打下坚实基础。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₁: 农民工“市民”身份认同对其城市定居意愿有正向影响

2. 身份认同与农民工城市归属感

由于户籍制度等的限制,农民工的身份与生活

场域之间存在不一致的现象,即“生活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导致不少农民工存在二元模糊的身份认同危机^[25]。农民工“市民”身份认同会进一步延伸至对社会网络及生活空间的认同^[26],那些对“市民”身份认同程度更低的农民工,更容易陷入社会交往局限于“老乡关系”的“内卷化”困境^[27]。尽管进城前的初级社会资本在农民工进入城市初期发挥着链条输送、提供资本和推动认同的作用,但随着融入程度的深化,初级社会资本的乡土性弊端日益凸显^[28],成为农民工城市融入和城市归属感提升的阻碍因素^[14,29]。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₂: 农民工“市民”身份认同对其城市归属感有正向影响

3. 城市归属感与农民工城市定居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农民工作出城市定居决策之前,会首先考量其在城市生活的体验、被接纳和对该城市的依恋状态^[30]。研究发现,城市归属感是农民工城市定居决策的决定性变量。如才国伟等采用 OLS 回归模型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归属感是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关键^[31]。王玉君基于 12 个城市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城市归属感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响的内在机制^[14]。同时,城市归属感还可充当其他因素作用于定居决策的中介变量。张敏等认为城市归属感在迁移模式与农民工城市定居之间具有一定调节作用^[32]。李东平等基于厦门、泉州两地的调查分析,证实城市归属感在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城市定居意愿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33]。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₃: 城市归属感对农民工定居意愿有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项目组 2019 年对武汉、郑州、北京三个城市农民工进行的实地调研。农民工流动性大、居住状况复杂,本研究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分三个阶段进行调查:第一阶段: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问题表现相对更为典型的中东部地区 19 个省会城市(直辖市),利用外来流动人口登记计算机系统随机抽取三个城市,确定武汉市、郑州市、北京市为本次调查重点城市。第二阶段:由于以上三个城市均为常住人口超过 1 000 万的超大城市,其流动人口规模巨大,不便于在全市范围内进

行随机抽样,因此项目组在以上三个城市中各选取一个下辖区进行调查,将调查区域确定为武汉市(蔡甸区)、郑州市(金水区)、北京市(海淀区)。第三阶段:深入以上选定区域的商业区、建筑工地、生产车间、高校后勤集团等,在各区随机抽取 500 位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并选定部分受访农民工进行个案访谈。本次调查内容涉及受访农民工个体基本信息、身份认同状况、城市归属感状况、城市定居意愿等四个部分,共计 50 道题。对回收样本进行初步筛选,并剔除部分缺失核心信息的样本后,共获得 1 286 个有效样本。

2. 变量选择

(1) 因变量。因变量是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即农民工是否有在务工城市长久工作和生活的打算。它具有以下涵义:一是定居以家庭为单位,不再是部分成员或单个人的行为;二是城市定居意味着农民工的永久居住地发生改变,而不再是“乡”与“城”之间的长期流动。

(2) 自变量。自变量包括身份认同和城市归属感。城市归属感是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生活场域产生归属的一种情感表达和心理依赖。身份认同是指农民工对“市民”身份所裹挟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认知、接纳和内化过程,蕴含着农民工群体对自我身份实现从“农民”向“市民”转变以及被城市社会认可的渴求。在身份认同变量的设置上,本研究在周明宝^[17]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将身份认同变量操作化为自我角色认同、收入地位认同、制度处境认同、生活方式认同、人际交往认同五个维度。自我角色认同指标侧重农民工心理面对自我角色的认定。收入地位认同指标强调农民工对自身收入水平和收入地位的感知。制度处境认同指标是农民工对户籍制度和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认同程度。生活方式认同指标是农民工对市民言行举止、消费习惯和闲暇生活的认同状况。人际交往认同指标主要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包括初级社会资本和新型社会资本)加以考察。

(3) 控制变量。借鉴以往相关研究,除了身份认同和城市归属感以外,农民工个体特征和流动特征也是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重要变量,因此将性别、文化程度、来源地、务工城市、进城务工年限和农村宅基地退出意愿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模型。

变量含义与样本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变量含义与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解释	均值	标准差
城市定居意愿	您是否会在务工城市定居(否=0, 是=1)	0.3451	0.4756
城市归属感	您对务工城市归属感强(否=0, 是=1)	0.5406	0.4985
身份认同	您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吗(否=0, 是=1)	0.3180	0.4659
自我角色认同指标	您认为自己的月工资收入与务工城市的房价差距大吗(很大=1, 比较大=2, 一般=3, 比较小=4, 很小=5)	2.7441	1.4828
收入地位认同指标	未来您可能将户口迁至务工城市吗(不可能=0, 可能=1)	0.3244	0.4683
制度处境认同指标	您对目前在城市享受的社会保障满意吗(很不满意=1, 不太满意=2, 一般=3, 比较满意=4, 非常满意=5)	2.7948	1.1218
人际交往认同指标	城市生活中, 您对老乡非常依赖(非常认同=1, 不太认同=2, 一般=3, 比较认同=4, 很不认同=5)	2.8094	0.9477
生活方式认同指标	您认为当地人对您有偏见和歧视吗(非常多=1, 比较多=2, 一般=3, 比较少=4, 非常少=5)	3.1006	1.2701
	您与本地人的沟通交流多吗(非常少=1, 比较少=2, 一般=3, 比较多=4, 非常多=5)	2.6185	1.0226
	您是否尝试过主动改善与当地居民的关系(没尝试过=0, 尝试过=1)	0.5272	0.4995
	您认为您的言行举止与市民无差异(否=0, 是=1)	0.4628	0.4988
个体特征	您认为您的消费习惯与市民无差异(否=0, 是=1)	0.2500	0.4332
	您认为您的闲暇生活与市民无差异(否=0, 是=1)	0.6738	0.4690
	性别(男=0, 女=1)	0.4747	0.4996
流动特征	文化程度(未上过学=1, 小学=2, 初中=3, 高中=4, 大专及以上=5)	3.1886	1.0010
	来源地(省外=0, 省内=1)	0.4116	0.4923
	务工城市(郑州=1, 武汉=2, 北京=3)	2.0070	0.8032
	进城务工年限(连续变量): 您进城务工已经有()年	9.9806	7.0219
	农村宅基地退出意愿: 您是否愿意将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否=0, 是=1)	0.3510	0.4775

3. 模型选择

本研究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假定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概率为 $P(Y=1)$, 那么农民工不会在城市定居的概率则为 $1-P(Y=0)$, Logistic 模型形式为:

$$P = \frac{Exp(Y)}{1 + Exp(Y)} \quad (1)$$

在式(1)中, Y 是变量 x_1 (身份认同) x_2 (城市归属感) x_3 (个体特征) x_4 (流动特征) 的线性组合:

$$Y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beta_3 x_3 + \beta_4 x_4 + \varepsilon \quad (2)$$

在式(2)中, β_0 为回归常数, β_1 、 β_2 、 β_3 分别为变量 x_1 (身份认同), x_2 (城市归属感), x_3 (个体特征) x_4 (流动特征) 的回归系数, ε 为误差项。

四、实证研究及其结果分析

鉴于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响内在机制的复杂性, 本研究通过三个问题加以考查: 一是身份认同是否是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重要影响变量, 各指标的影响权重如何? 二是城市归属感在身份认同与定居意愿中是否存在中介作用? 三是身份认同对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1. 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机制

模型 1 为控制变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响的基准回归模型, 模型 2 至模型 6 依次引入身份认同的各个指标, 具体结果见表 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身份认同五个指标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系数均为正值, 说明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_1 得到验证。五个指标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权重大小排序依次为收入地位认同、生活方式认同、人际交往认同、自我角色认同和制度处境认同。具体而言, 农民工收入地位认同指标每提升 1%, 其城市定居意愿提升 167.5%。收入因素依然是目前制约农民工城市定居的最大障碍。根据新劳动力迁移理论提出的“相对剥夺感”概念, 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会感知自身处于不利地位的被剥夺感, 这种感受往往是与某一个具体标准或参照系比较后产生的^[8]。当农民工感知到收入水平与当地房价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时, 其被剥夺感越发凸显, 承受心理压力越大, 自我能力判断越趋向悲观, 从而影响其定居意愿。生活方式认同指标每提高 1%, 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发生比就提高 156.0%, 说明农民工城市定居有赖于其对市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的高度认同和适应, 农民工在逐渐习得城市居民的言行举止、消费习惯

和闲暇生活的过程中,乡土气质逐渐消退,留城定居意愿得以增强。农民工人际交往认同指标每提高 1%,其在城市定居的发生比就提高 149.4%。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农民工通过强化与市民之间的积极互动扩展新的社会资本,降低对以老乡关系为主的原始社会资本的依赖,有利于推进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农民工自我角色认同指标每提高 1%,其城市定居意愿就提高 101.8%。当农民工个体在认知上将自我归类为“市民”时,在主观上会对市民群体

产生“认同感”和“亲近感”,从而赋予该群体更多正面评价的内群体偏向,进而在行为意愿上(如定居城市)积极与“市民”靠拢。农民工制度处境认同指标每提高 1%,其城市定居意愿就提高 51.5%。制度障碍依然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当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制度处境得以改善时,其安全感得以提高,城市边缘心态得以缓解,城市定居意愿也相应得到提升。

表 2 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模型 1 B(Exp(B))	模型 2 B(Exp(B))	模型 3 B(Exp(B))	模型 4 B(Exp(B))	模型 5 B(Exp(B))	模型 6 B(Exp(B))
自我角色认同指标		2.027*** (7.593)	1.544*** (4.684)	1.352*** (3.867)	1.225*** (3.405)	1.018*** (2.769)
收入地位认同指标			1.810*** (6.109)	1.768*** (5.861)	1.708*** (5.519)	1.675*** (5.341)
制度处境认同指标				0.598** (1.819)	0.481* (1.617)	0.515* (1.674)
人际交往认同指标					1.396*** (4.039)	1.494*** (4.456)
生活方式认同指标						1.560*** (4.757)
性别	0.953*** (2.593)	1.000*** (2.719)	1.307*** (3.694)	1.386*** (4.000)	1.384*** (3.992)	1.360*** (3.898)
文化程度	0.938*** (2.555)	0.820*** (2.270)	0.985*** (2.679)	0.915*** (2.497)	0.881*** (2.413)	0.825*** (2.281)
来源地	0.901*** (2.462)	0.689*** (1.992)	0.998*** (2.712)	0.959*** (2.608)	1.130*** (3.096)	1.087*** (2.966)
务工城市	-1.379*** (0.252)	-1.196*** (0.302)	-1.127*** (0.324)	-1.169*** (0.311)	-1.146*** (0.318)	-1.202*** (0.301)
进城务工年限	0.865*** (2.376)	0.848*** (2.335)	1.521*** (4.578)	1.568*** (4.799)	1.625*** (5.080)	1.593*** (4.916)
农村宅基地退出意愿	1.152*** (3.164)	1.007*** (2.737)	1.204*** (3.334)	1.184*** (3.268)	1.344*** (3.834)	1.265*** (3.542)
常数	-3.191*** (0.041)	-3.716*** (0.024)	-10.819*** (0.000)	-11.310*** (0.000)	-14.269*** (0.000)	-14.748*** (0.000)
卡方检验	610.760***	731.215***	1127.981***	1130.356***	1119.913***	1106.092***
-2LL	917.588	787.824	364.668	352.988	338.463	326.633
Cox&Snell R ²	0.401	0.461	0.621	0.624	0.625	0.626
Nagelkerke R ²	0.555	0.638	0.859	0.863	0.867	0.869
N	1191	1183	1164	1156	1142	1124

注:***、**、* 分别表示变量的显著性在 1%、5%、10% 水平以内。B 为回归系数,括号内为 Exp(B),即相应变量的优势比。

从模型 1 到模型 6,控制变量不管是在显著性水平还是在影响方向上,都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性别差异,与男性相比,女性所承担的买房等经济压力更小,留城定居成本更低,因此其留城意愿更强。以文化程度为典型指标的人力资本对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作用显著。农民工文化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实现在务工城市定居。从来源地来看,省内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明显高于省外农民工。从郑州市、武汉市到北京市,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逐步递减,这可能与城市规模和城市房价有关,农民工留城定居的成本越高,定居意愿越低。务工年限在 8 年以上的农民工,其城市定居意愿是务工 8 年及以下农民工的 2.376 倍。可能的解释是,在城市务工时间较长的农民工,城市生活适应性和归属感不断增强,更希望实现家

庭化迁移^[2,31]。有农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农民工,其城市定居意愿是没有农村宅基地退出意愿农民工的 3.164 倍。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农民工自愿、有序、有偿地退出农村宅基地,某种程度上能够激发他们“自由外出获利”,以更坚定的决心投身城市生活,实现真正意义的市民化。

2. 城市归属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验证 H₂ 和 H₃,建立模型 7 至模型 10 进行分析(表 3)。模型 7 显示,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起显著正向影响(B_a=2.765, p=0.000), H₂ 得到证实。近年来,随着农民工问题在国家和社会层面获得高度重视,农民工的社会身份逐渐获得大众认可,农民工群体所受的偏见和歧视日趋减少。当他们在生活方式、收入地位、人际交往、制度处境等各方面与市民接近时,能够充分激发他们对务工

城市的归属感。模型 9 显示，城市归属感对农民工定居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H₃ 得到证实。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生活场域后，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角色

多重、制度歧视、自我心理定势和交往偏见等困境，他们在漂泊的生活中难以形成对城市社会的归属感和确定感，从而降低了其城市定居的意愿。

表 3 身份认同、城市归属感对农民工定居意愿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城市归属感 B(Exp(B))	城市定居意愿 B(Exp(B))	城市定居意愿 B(Exp(B))	城市定居意愿 B(Exp(B))
身份认同	2.765*** (15.879)	6.960*** (1 053.112)		6.545*** (696.041)
城市归属感			2.824*** (16.836)	1.282*** (3.604)
控制变量	——	——	——	——
常数	-2.914*** (0.054)	-14.506*** (0.000)	-5.580** (0.004)	-14.885*** (0.000)
卡方检验	463.587***	1 087.448***	800.812***	1 095.421***
-2LL	1 083.091	345.277	719.063	328.851
Cox&Snell R ²	0.340	0.620	0.492	0.625
Nagelkerke R ²	0.453	0.860	0.680	0.867
N	1117	1124	1184	1117

注: **、*、* 分别表示变量的显著性在 1%、5%、10% 水平以内。B 为回归系数，括号内为 Exp(B)，即相应变量的优势比。

为验证城市归属感在身份认同与城市定居意愿中是否存在中介作用，本研究运用温忠麟等^[34]提出的检验办法对城市归属感的中介效应加以验证。具体步骤为：检验模型 8 中身份认同的回归系数 c 是否具有显著性；检验模型 7 中身份认同的回归系数 a 是否具有显著性；检验模型 10 中身份认同的回归系数 c' 以及城市归属感的回归系数 b 是否具有显著性。结果显示，B_a=2.765，B_b=1.282，B_c=6.960，B_{c'}=6.545，回归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下统计显著；通过模型 8 和模型 10，可以发现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效果减弱 (B_c=6.960，B_{c'}=6.545)，证实城市归属感在身份认同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可知，城市归属感起到的中介效应与总效应之比为 $[B_a \cdot B_b / (B_a \cdot B_b + B_c)] = 0.3513$ ，直接效应与总效应之比为 $1 - 0.3513 = 0.6487$ ，即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效应中，有 64.87% 是直接效应，有 35.13% 是通过城市归属感这一中介变量形成的间接效应。

3. 身份认同对城市定居意愿影响的代际差异

由于家庭成长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背景存在巨大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水平、消费方式、价值观念、职业期待、心理素质、对生活质量的的要求方面各有不同，其在身份认同、城市定居意愿上也存在差别^[3]。鉴于此，本研究进一步探讨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响的代际差异，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4。

表 4 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响的代际差异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第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
	B(Exp(B))	B(Exp(B))
自我角色认同指标	1.739*** (5.690)	1.817*** (6.154)
收入地位认同指标	1.586*** (4.884)	2.039*** (7.682)
制度处境认同指标	1.020*** (2.774)	0.410 (1.507)
人际交往认同指标	1.184** (3.266)	1.675*** (5.341)
生活方式认同指标	0.697 (2.008)	2.373*** (10.726)
控制变量	——	——
常数	-13.054*** (0.000)	-12.512*** (0.000)
卡方检验	161.205***	754.600***
-2 对数似然比	140.421	224.161
Cox&Snell R ²	0.311	0.656
Nagelkerke R ²	0.620	0.875
N	433	708

注: **、*、* 分别表示变量的显著性在 1%、5%、10% 水平以内。B 为回归系数，括号内为 Exp(B)，即相应变量的优势比。

总体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身份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更大。具体而言，制度处境认同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自我角色认同、收入地位认同、人际交往认同、生活方式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均大于第一代农民工。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身份认同各指标对其城市定居意愿影响的大小依次为自我角色认同、收入地位认同、人际交往认同、制度处境认同、生活方式认同。身份认同各指标对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权重大小依次为生活方式认同、收入地位认同、自我角色认同、人际交往认同、制度处境认同。由于出生环境和成长时代背景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制度排斥感受更为强烈,“市民”身份认同程度更低,城市适应能力也相对更弱,而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与市民更为接近,城市适应能力更强,融入城市社会渴望更为强烈,也更期盼通过定居城市实现成为“城里人”的梦想。

五、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本研究以城市归属感为中介变量,探讨了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认同“市民”身份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可能性越大;在身份认同的五个指标中,收入地位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最大,其次分别为生活方式认同、人际交往认同、自我角色认同、制度处境认同;城市归属感变量在身份认同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具有代际差异;总体而言,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身份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更大,具体来说,自我角色认同、收入地位认同、人际交往认同、生活方式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第一代农民工,而制度处境认同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新生代农民工。

上述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含义:

(1) 稳步提升农民工的收入地位,夯实城市生活的物质基础。探索制定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在条件允许情况下稳步提升其工资水平,使其接近当地居民平均工资水平,力求农民工工资增长水平与务工地GDP增长保持基本同步。启动农民工综合素质整体提升工程,根据农民工个体发展需求采取就业扶持政策,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民工技能培训,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使其具有相对稳定的就业岗位,以从容应对市场竞争。

(2) 积极培育农民工的社交网络,创造融入城市的社会氛围。通过社区参与搭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互动交流平台,如鼓励农民工广泛参与卫生

大扫除、花草树木养护、治安义务巡逻、亲子运动会和读书会、广场舞竞技等社区活动,强化农民工对社区的情感依赖和归属感。此外,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大众媒体对“尊重农民工”社会文化氛围的营造作用,强化农民工正面形象的宣传和报道,引导市民缓解乃至消除对农民工的偏见与歧视,促进对农民工的交流、理解与持续关注,提升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3) 优化农民工市民化制度供给,加强城市定居的顶层设计。进一步推进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创新农民工城市落户办法,逐渐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住房、医疗、随迁子女教育、社会服务等户籍利益,让农民工充分共享城市发展成果。完善农民工城市购房扶持机制,如对务工达到一定年限、社会保险缴纳达到一定期限、农村退出意愿强烈的农民工在城市购房方面适当予以贷款条件放宽、贷款期限延长、贷款额度增加以及贷款利率优惠等政策倾斜。同时,将农民工市民化质量纳入基层政府、社区自治组织、企业信用和社会责任的考核体系,积极探索和创新农民工公共服务成本多元化分摊机制,结合农民工流动性强、经济能力弱等特点量身定做农民工社保以改善农民工的制度处境。

(4) 对两代农民工采取区别化政策,充分发挥政策“靶向”效应。由于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中的积极性相对缺乏,城市适应能力相对不足,在城市定居决策上观念更为保守,应注重进行思想引导以缓解其留城的心理障碍,并着重从户籍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改善其制度处境,以免除其后顾之忧。新生代农民工更看重城市融入中的尊重和社会认可等精神需求的满足,因此在政策制定时更应着重对这一群体进行“增权赋能”,给予他们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环境公平和人文关怀,使其“有尊严”地留在城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以积极的心态拥抱城市生活。

注释:

- ① 本研究对于我国三个地区的划分借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地区划分方法。
- ② 该题考察农民工城市社会交往的主动性,即在市民交往过程中,农民工是否通过一些主动尝试积极改善与市民之间的关系。这些尝试包括在工作上相互帮助,生病时给予问候和关心,经济困难时慷慨相助,逢年过节相互问候、互赠礼物,帮忙拿主意、做决定,心情烦躁时相

互开导,向当地人学习当地方言等。当受访者尝试过上述任意一项努力时,即为“尝试过”。

- ③ 本研究关于农民工的代际划分采用 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划分办法,即把出生在 1980 年以前的农民工划分为“第一代农民工”,出生在 1980 年后的农民工划分为“新生代农民工”。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10(6): 4-16.
- [2] 高健, 张东辉. 个体迁移、家庭迁移与定居城市: 农民工迁移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16(4): 99-102.
- [3] 刘传江, 程建林, 董延芳. 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研究[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9: 19-144.
- [4] 戚迪明, 张广胜. 农民工流动与城市定居意愿分析——基于沈阳市农民工的调查[J]. 农业技术经济, 2012(4): 44-51.
- [5] 王伟, 陈杰, 艾玮依. 新生代农民工在三四线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基于 2014 年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考察[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4): 30-37.
- [6] 卢海阳, 郑逸芳, 钱文荣. 农民工融入城市行为分析——基于 1632 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J]. 农业技术经济, 2016(1): 26-36.
- [7] 蔡禾, 曹志刚. 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来自珠三角的实证分析[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1): 148-158.
- [8] 李强. 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205-230.
- [9] 张在冉, 杨俊青. 居住条件、子女就学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基于 2017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分析[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20(3): 84-98.
- [10] 汪润泉. 子女教育期望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基于全国 7 个城市调查数据[J]. 农业技术经济, 2016(3): 75-84.
- [11] 陆万军, 张彬斌. 就业类型、社会福利与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来自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J]. 经济学家, 2018(8): 34-41.
- [12] 赵建国, 周德水. 养老保险、定居期望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J]. 农业技术经济, 2018(10): 36-47.
- [13] 汪润泉, 刘一伟. 住房公积金能留住进城流动人口吗——基于户籍差异视角的比较分析[J]. 人口与经济, 2017(1): 22-34.
- [14] 王玉君. 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十二个城市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J]. 人口研究, 2013(4): 19-32.
- [15] 钱龙, 钱文荣. “城镇亲密度”、留城定居意愿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J]. 财贸研究, 2015(6): 13-21.
- [16] 何微微, 胡小平. 认同、归属与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重庆市的调研数据[J]. 农村经济, 2017(8): 122-127.
- [17] 周明宝. 城市滞留型青年农民工的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J]. 社会, 2004(5): 4-11.
- [18] 刘于琪, 刘晔, 李志刚. 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J]. 地理科学, 2014(7): 780-787.
- [19] 李飞, 钟涨宝. 人力资本、阶层地位、身份认同与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J]. 人口研究, 2017(6): 58-70.
- [20] 蔡禾, 王进. “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7(6): 86-113.
- [21] REED A. Social identity as a useful perspective for self-concept-based consumer research[J]. Psychology & Marketing, 2002(3): 235-266.
- [22] 王美艳. 农民工消费潜力估计——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系[J]. 宏观经济研究, 2016(2): 3-18.
- [23] 邓睿. 身份的就业效应——“城市人”身份认同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经验考察[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9(5): 91-104.
- [24] 宋艳姣, 王丰龙. 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 2014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J]. 财经论丛, 2020(2): 3-11.
- [25] 李蓉蓉, 段萌琦. 城镇化进程中中国新市民的身份迷失——身份认同危机的类型学研究[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9(3): 118-125.
- [26] 王春超, 张呈磊, 周先波. 社会关系网、朋友圈效应与农民工收入[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5(3): 65-80.
- [27] 林李月, 朱宇. 两栖状态下流动人口的居住状态及其制约因素——以福建省为例[J]. 人口研究, 2008(3): 48-56.
- [28] 李义波, 朱考金. 农民工融合度主观认知状况: 身份认同, 城市归属与发展规划——以江苏省 1085 名农民工为例[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 96-101.
- [29] 赵川芳. 农民工子女城市归属感影响因素分析[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14(5): 31-40.
- [30] 黄侦, 王承璐. 农民工城市归属感与购房意愿关系的实证研究[J]. 经济经纬, 2017(2): 43-48.
- [31] 才国伟, 张学志. 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与定居决策[J]. 经济管理, 2011(2): 158-168.
- [32] 张敏, 郑晓敏, 卢海阳. 迁移模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福建省 2635 名农民工的实证分析[J]. 调研世界, 2020(9): 55-60.
- [33] 李东平, 卢海阳. 公共服务满意度, 城市归属感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基于福建省厦门、泉州两地的调查分析[J]. 农村经济, 2020(3): 136-143.
- [34] 温忠麟, 张雷.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 2004(5): 614-620.

责任编辑: 曾凡盛